

福建文史

許心題



2003 年
第二期

則大塊平洋將安所求之乎

羅經針屬雖有正針中針縫針盤屬雖有內盤

中盤外盤卦屬雖有天紀地紀連山歸藏周易

之不同四字以蔽之曰龍卦金度而已所以用

此四字者明相生相尅之理以定吉凶而已穩

哉。吉管公明云四勢任君裁五行當自守豈易言

陽基多遵洪範水法陰地多遵三合水法吾以

陽基陰地宜遵四經水法以人力折於堦簾內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主办

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

——胡锦涛

新中国刚刚建立，毛主席、周总理就决定设立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参事工作和文史馆工作，把它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5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广大的参事和馆员为国家的建设，为人民的利益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在新的历史时期，参事室和文史馆要继续发挥统战联谊和参政咨询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加强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提供咨询建议，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加强民主监督，才不会人亡政息。

广大参事、馆员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广交朋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更多的海内外同胞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新贡献。

——温家宝

福建文史

目 录

(总第26期)

2003年第2期

-
- 毛泽东与文史研究馆 王同策 (2)
-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五十年 (5)
- 直把激情献征程
——写于陈虹同志逝世一周年
..... 彭 冲 骆 平 (6)
- 学人论坛**
- 沈葆楨的《居官圭臬》及其江西
民政改革 郑寿岩 (8)
- 徐寅生卒考辨及“拂衣”归隐问题
..... 许更生 (14)
- 陈元光族姓新考 黄超云 (20)
- 闽台关系**
- 试论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的影响
..... 徐翠红 (25)
- 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
对台湾的文化冲击 张 媚 (30)
- 开港初期怡和洋行在台湾的经营活动
..... 黄旻敏 (33)
- 文史纵横**
- 秦系—韩偓之隐 李瑞良 (38)
- 《仙溪志》简介 游自勇 (41)
- 闽南侨乡一个奇异的螟蛉子家族
..... 李 原 (45)
- 人物春秋**
- 弘扬嘉庚精神 创办福建音乐大学
..... 杨 扬 (53)
- 艺林漫步**
- 怀念文学的美丽 欧孟秋 (57)
- 从“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谈起
..... 龚世润 (59)
- 序 跋**
- 《江文丛稿》自序 陈 虹 (61)
- 《铁骨丹心》自序 林祖慰 (62)
-

《福建文史》编委会

主 任：余险峰 副主任：欧孟秋
委 员：任仲泉 余险峰 欧孟秋
郑寿岩 赵玉林 廖楚强
主 编：欧孟秋

[本期执行编辑 钟荣誉]

主办：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编辑：《福建文史》编辑部

地址：福州市东大路73号3号楼

邮编：350001 电话：(0591) 7531484

印刷：福州市万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3年12月25日

毛泽东与文史研究馆

□ 王同策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可谓日理万机。作为常人的毛泽东，交际也是广泛而多层的。从现已公布的他的书信中，有些涉及到文史研究馆及其馆员。其中不乏意蕴醇厚、颇堪品味者。

（一）“文史机关事大略亦因此， 便当询之”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向他的老师符定一先生谈到过要设立一个机构，以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先生们。可见文史研究馆的建立，可说是毛泽东亲自拟议并给予极大关注的。其后，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符定一先生就被聘任为第一任文史研究馆馆长。符定一先生慧眼识珠，毛泽东1912年报考湖南省立一中时，国文成绩第一，因其文章妙笔惊人，有人疑其有伪，时任校长的符先生亲自面试，果然文采斐然，确是优秀人才，即动员其一定入学就读，入学后又精心培养。所以周恩来总理说，符先生的一大贡献就是最早发现毛主席是中国的杰出人才。

毛泽东涉及文史馆较早的信，当推1949年12月2日写给柳亚子先生的。众所周知，毛泽东与柳亚子有很深的友谊，诗词唱和，信函往返。毛泽东对柳亚子的爱国精神十分钦佩，对他的诗文更为推崇，在一封给他的信中

评价说：“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1949年末的信是这样的。

柳老：

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因忙迟复为歉。车中信未见，厚意敬领。题字册便时当代询。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文史机关事大略亦因此，便当询之。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

其时，正在酝酿建立文史研究馆，为此事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征求过柳亚子等先生的意见。其后，可能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工作太忙，搁置了一段，柳遂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问到此事。毛泽东这里巧妙地用了“周公”“吐握”的典故，周武王发死后，其弟周公旦辅武王之子成王诵，为了不失去天下贤人，“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总理正好姓周，所以这“周公”就语寓双关。意思是说总理工作太忙，可能忘记了安排此一工作，我一定代为询问。话不大多，表现出毛泽东对柳老的尊重和对文史研究馆筹建工作的重视。文史研究馆建立，柳亚子即与叶恭绰、章士钊一起被聘为副馆长。

（二）“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一文，写得很好”

毛泽东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关怀，重点当然

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参加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他认为是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极好机会，所以尽可能动员他们参与其中。从而了解社会、经受锻炼。1951年3月2日他写给胡乔木的一封信中就说及此事：

乔木同志：

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三月二日

文章中说到的萧乾是著名的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的战地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用笔讴歌社会主义祖国。在土改中他拍摄的农民烧毁地契的照片，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珍贵历史资料。作为文坛上的多面手，萧乾为人民奉献出了许多精品。朱镕基总理曾写信给他称赞说：“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作等身，为中国之文学、新闻、编译事业作出宝贵贡献。”萧乾1986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年4月任馆长。1999年去世。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另一封信中，还推荐了民盟成员、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参加土改运动所写的心得体会文章。

（三）“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给其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提到一件事：

“……

（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

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这里说的李淑一当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1950年她曾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给她的复信中说：“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1957年，为答李淑一所赠纪念柳直荀的《菩萨蛮》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我失骄杨君失柳”《蝶恋花》词。其情其事，感人至深，影响深远。时隔多年后，朱镕基总理在给李淑一之子柳晓昂的信中说：“直荀同志，钟三湘灵秀，成革命先驱，忠诚为党，奋不顾身，惨作王明路线牺牲，长令后人掩史太息。淑一同志忠贞不易，艰苦备尝，得毛主席《蝶恋花》一词……足慰忠烈。”使人们对柳直荀同志牺牲本身，更有了一个真确的了解。

从这封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使我们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曾向文史研究馆推荐馆员，而且“荐了几个”，结果竟然“没有录取”。以毛泽东的地位与身份，延后若干年，不用说推荐几个文史研究馆员，就是决定几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也不过只是一句话的事。而到了“文革”事起，“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万句”的造神运动时期，就更是不在话下了。这封信充分说明当时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还比较正常。是严格按规矩办事，而不是以“谁说的”为标准。尤其可贵的是，毛泽东本人对于文史研究馆对他数荐不纳一事的看法，认为是由于“文史馆资格颇严”，是自己推荐的人的资格

还不太够，所以对李淑一，尽管有人求他举荐，鉴于此前“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所以感到“未便再荐”。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认为这一情况非常正常，心态十分平和。表现出领袖人物的博大胸怀与高尚情操。出语意切情真，毫无矫饰成份，令人感动。赠资助困一节，从后来毛泽东确曾给李淑一汇寄钱款来看，李肯定是同意接受帮助的；而任文史馆员一事，是直到8年以后，李淑一同志才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而她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员，则更在23年之后1977年。这时，毛泽东已经去世。

（四）“请问一下 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1961年11月6日上午8点半，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

有一首七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8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时隔片刻，又补一函：

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毛泽东当日8时。

从时间上推算，很可能是毛泽东在写《卜算子·咏梅》时，想看看有关的“咏梅”作品，才有了这个要求。信中提到的这首七律

诗，其实是明人高启写的《梅花九首》中的第一首。毛泽东要找的“下四句”是：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毛泽东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由此也可见毛泽东对文史馆员业务知识上的信赖和对文史馆员的尊崇。

说来惭愧，我也忝列馆员同仁之末，又从事历史文献研究教学工作，初读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马上自省，搜索记忆，虽似曾相识，但印象淡漠。平日接触较多的是唐宋作品，清代稍多涉及一些，如元、明作家作品，确乎知之甚少。即刻翻查，从《佩文韵府》中“高士”条查得，始知其详。面对“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一语，甚感惶愧。

除上述者外，毛泽东与之通信的文史馆员还很多：如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章士钊、副馆长叶恭绰、馆员齐白石、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张元济、湖南省文史馆馆长曹子谷、馆员李思安、李漱清等等。这些信对收信人或谦称“受业”，或敬为兄长，有问即答，事必躬亲。如姻亲知己，融和协谐；似友朋同志，平易近人。给人的感受是风雨故人，促膝夜话，尽畅胸怀，如坐春风。而书信之外，毛泽东与文史馆员之间的故事更属多多。如在重庆谈判时结识作家张恨水，赠物留念。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看到张伯驹所送挽联而得知张当时生活的窘困情况，当即指示妥善安排，张伯驹遂被聘为文史馆员并得以回北京落户，张、潘夫妇生活始得转机等等，均流布遐迩，传为佳话。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五十年

1952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同年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的补充决定》，由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孟冬波负责筹备设立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1953年1月12日，福建省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福建省人民政府以（53）府办第00024号通知：“为贯彻省府常委会关于成立文史研究馆的决议，特聘任陈培锬委员为文史研究馆馆长，傅柏翠委员及马宁同志为副馆长，请即日开始办公，继续延聘馆员，开始工作。”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作为荣誉性、统战性的文史研究事业单位，隶属省人民政府，从1956年7月起由福建省政府委托福建省政协代管。

1953年建馆时，设馆长1人，聘请建国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前清翰林陈培锬担任，副馆长2人，分别聘请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民革副主委傅柏翠和省文教厅文化处处长、前“左联”作家马宁担任；1954年，增设副馆长1人，聘请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民国时期最高法院庭长翁敬棠担任。1964年，陈培锬逝世，副馆长傅柏翠接任馆长。1989年，馆长傅柏翠因年

事已高，改聘为名誉馆长，聘请原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虹担任馆长，副馆长马宁亦于同年改聘为名誉副馆长。后陆续增聘郑朝宗、俞元桂、舒风、郑乃珖、吴修秉、余险峰、欧孟秋等副馆长。

文史研究馆组成的主体是馆员。馆员的聘任程序是：由有关部门推荐，经省委统战部综合平衡并征求文史研究馆意见后，报省政府批准，由省长颁发聘书。到1966年，文史研究馆共聘任馆员185人，名誉馆员6人，特约撰述员10人。聘任馆员的条件是：年龄在60岁以上，学有专长、艺有专精而生活又有困难的社会人士（即通常所说的“文、老、贫”）。福建历史上素有“海滨邹鲁”之

称，科甲蝉联，文化发达；福州、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人们易于接受外来进步思想；又长期受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统治，因此早期馆员组成特点有五多，即：前清遗留下来的举人、贡生、秀才多；同盟会会员和参加福建光复之役的人士多；中、上层旧军政人员，特别是闽系海军人员多；诗人和书画家多；戏曲界和工艺美术界老艺人多。分布地区多集中在省会福州，其次在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地区。1980年文史研究馆恢复馆务活动时，“文化大革命”前所聘馆员，仅存12人，后又分批续聘馆员计134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

直把激情献征程

——写于陈虹同志逝世一周年

□ 彭 冲 骆 平

去年7月，知交60余年的战友陈虹在福建病逝。周年之际，追忆故人，不禁心神激荡，凝思寂然。陈虹同志1935年即投身革命，他是一名从烽火硝烟的战斗中走出又走进建设新中国文艺战线老战士，他的革命精神以及他的人品和才华一直为众人称颂，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不息的光辉轨迹。

陈虹同志是一位有坚定信念的人。上个世纪30年代，还不满15岁的陈虹加入了“芗潮剧社”，芗潮剧社是由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在闽南大地掀起阵阵革命狂潮。正是在芗潮剧社这个革命团体里，我们与陈虹同志相识、相知，并结下

吸收馆员的对象逐渐从生活困难的年老旧文人转变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有名望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即从“文、老、贫”变为“文、老、名”），同前一时期相比，馆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明显提高。

本着“敬老崇文”的宗旨，党和政府十分关怀和重视馆员的政治进步和生活情况。文史研究馆虽然没有硬性的学术研究任务，可是馆员们都有发挥余热、为祖国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的积极性，因此文史研究馆的文史、诗歌、书画篆刻创作得以蓬勃发展，在编辑八闽文献与闽人著述《福建丛书》，开展军民共建、扶贫赈灾、海内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收到丰硕成果。

往，兄弟馆举行工作座谈会、研讨会，福建馆都应邀派人参加；兄弟馆组成考察团来闽访问，本馆亦热情接待。福建馆与兄弟馆交流密切。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本馆与其他文化单位、团体，也时有联系交往，互相切磋；其文化交流还远及港、台地区和海外各地。这些交流活动，促进文史研究馆的工作，扩大文史研究馆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省文史研究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喜人的成绩。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开拓未来。在新的时期，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将与时俱进，履行宗旨，奉献社会，继续作出更大的努力。

（摘自《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志》）

我国各文史研究馆之间声息相通，时有交

深厚的革命友谊。陈虹在剧社排演的抗日宣传剧目《小英雄》中成功地塑造了小英雄的形象，他生动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自己赢得了“小英雄”的称号。随后，他又随芗潮剧社成员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战争年代从事军队文艺工作，还是建国以后从事政府文化工作部门的领导，陈虹始终不渝地以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方针、文艺精神为指导，并在新时期，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积极为推动文艺工作的开展和繁荣文艺创作做出贡献。

陈虹同志勤奋好学，认真严谨。年轻时，不论行军途中、马背上、交谈时、会议中，书札日记从不间断。20出头，就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总结归纳了《舆论动员方法探微》，提出自己对组织政治宣传工作的见地。未满30岁，他出任福建省文化局长，谱曲、剧作、编导样样在行。数十年里，他在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写作，著有剧本、诗词、文艺评论、文化札记上百篇，他创作的以颂扬家乡九龙江畔儿女齐心协力抗旱救灾事迹的剧作《龙江颂》使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龙江风格，在神州大地广为传颂。他的会议报告逻辑严谨，问题尖锐突出，观点浅显明晰。他撰写的大量文艺评论，具有工作的艺术性、专

业性、针对性、指导性。陈虹还是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人，他爱好广泛，文学、书法、摄影、音乐、舞蹈无所不能，幼时就能左右手正反两书。他在福建省文史馆任馆长时，运用他长期在福建省文化、统战方面的工作阅历，主持编辑了福建大型文史之作《福建丛书》。他的回忆文稿《岁月回眸》记录了充满血与火的洗礼的战争岁月，2003年出版的《江文丛稿》则收集了他对党的文化艺术工作评论、京剧现代戏《滨海飞鹰》、影响文学剧本《龙江颂》以及诗词杂咏等作品。遗憾的是，他未及看到《江文丛稿》的出版。

1996年春节，我们回漳州，在芗江之畔，我们这些老宣传队队员又聚到了一起，陈虹即兴赋诗两首：

抗日征途上，同台放下鞭^①。

举觞欢聚日，能不忆当年？

鹭鸟回眸望，知交六十年。

凯歌催鬓白，故地换新颜。

今日读来，耳畔犹响其朗声吟诵之声，豪迈之情不减。这恐是其终身锲而不舍，至死不渝追求的信念。

①指作者与陈虹当年同台演出的抗日街头名剧《放下你的鞭子》。

□ 郑寿岩

沈葆楨的《居官圭臬》 及其江西民政改革

沈葆楨于1855年以记名知府从江南道监察御史外放江西，次年调任广信知府；1862年因广信府保卫战的胜利逐步提升为江西巡抚。他在任上为江西战时民政做出许多改革，取得很大成绩，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和赞赏。沈葆楨在随后的船政、治台和两江总督的不同岗位，继续推进各项民政改革，体现了他从言官的道德理想主义趋向疆吏的新儒家的经世务实理想。探索沈葆楨在江西战时民政的运作，以及民政思想的转变过程，将进一步深化对沈葆楨的整体思想的研究。

(一)

沈葆楨担任江西巡抚所面临的局势是：与太平军的军事对垒由于保住了渐赣走廊而大有缓解和转机，江西社会渐趋稳定。他作为江西一省的行政长官，除要继续支援抗击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和军饷扒款外，收辑流亡，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将是民政工作的特点。他必须在战时体制下，改组并完善地方政权；整饬吏治，消除腐败；整理财政，增加收入；维护法律公正和安定地方秩序。他推行了配套的行之有效的整合和改革，既有理念的宣示，又有实践的

方案。

沈葆楨于1863年出版了《居官圭臬》，圭是观测日影、臬是测量广狭的仪器。《居官圭臬》便是“官员守则”，是一部官员行为学教科书，宣示了沈葆楨民政工作的理念。王景贤的序说：“盖闻圣人论政，皆本诸心，以心固为政之本而制治清浊之源也。”揭示了对官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徐宗幹的序说：“得一贤吏如得精英三千，与民相亲而犯上者，未之有也。”更强调了地方官的行为重要性，亲民是消弭社会动乱的根本。沈葆楨编印这部书正是他的行政学的理论和行为学的实践的结合。

《居官圭臬》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突出官员必须具有儒家忠孝合一的理念，二是制定了官员的行为规范，以及对执行刑律方方面面所提的具体要求。他把《文昌帝君忠经》和《孚佑帝君忠诰》列在篇首，假鬼神而立言，借因果报应劝戒以立信，是别具一番苦心的。十多年战争破坏了大量国家资源和公私财富，导致民不聊生，人心浮动，精神文明的心防也被严重摧毁。而修补心理防线就必须重建儒家的尊严，就不能不抬出神灵和因果报应之说以立信了。

国家作为一个概念，是统治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它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专政的组织。国家必须强调全民的无条件支持，这便是忠。家则是社会组织的细胞，而孝便成为细胞核的凝聚力量，是长幼尊卑的行为准则。家又是治国平天下的立足点，因此忠与孝的矛盾统一和整合必须孝服从于忠。所以《忠经》，以忠君为中心。忠和孝的大跨度相互矛盾必须孝服从于忠。所谓“伦理首重君亲，大义尤严冠履，虽事君事亲分有不同，而全忠全孝理惟一致”，提出了忠孝合一的理念，必须从忠于皇帝的最高准则推及到忠于公共福利，即所谓仁政之类的普遍法则。这样，忠君与重民做了很好的契合。《忠经》从四个方面诠释了这个理念。

第一致身。它说，“人生在世，亲生之，师教之，君成之”，域中之大，同归一致。所以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可见君恩与亲情是同一的。它劝世人当为心忠、为大忠、为终生之忠、为毋欺之忠。它对为官的提出了八个不要：不粉饰浮文，不结党倚朋，不依违利害，不瞻顾情面，不勤始怠终，不浅计近谋，不自谓清廉，不伪称骨鲠。这“八不要”仍有现实意义。

第二广忠。它把忠的要求进一步落实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它要求士人按时纳税，不戏弄文墨，妄谈国事；农工商贩要晓得一钱一物皆皇上所赐，终生不忘皇上的大恩大德；胥吏不作奸宄之伎俩，逞机械之心肠；仆之事主始终不懈，佃户也不能负主；等等。总之，从卿相以至庶人都是必须各守本分，效忠皇上。强调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绝对的、不可变易的。

第三正身。它指的是修身立志。要求人人

明义理，杜蔽惑，进而尽忠，退而补过。“凡我之人告于君者，皆先自吾身始”。皇权是不可侵犯的，要臣民“洗乃心，涤乃虑，矫其情，警其情。”

第四灵验。它是感应篇，讲因果报应。行忠会有报偿，而且明码实价。如做循吏和廉吏，“当报尔仕籍升迁”；“作天子股肱之助”，“报九世荣华”；最高回报是“报七祖超升”。^①这就是假鬼神以立信，把知识分子的崇高价值观降低到一本万利的商业行为了。

《忠诰》强调了三个方面：（1）天子是上帝所生，统率海内，以养万物，故忠有王侯、卿相、台谏、师傅、百职司以及边疆之督抚、有司，降而下为士农工商之分。尽忠就是要等级之人守等级之分，做等级之事，完等级之功。（2）天地间人为重，人之间君为尊，君之下臣为忠，臣之内忠为美。生为名臣，死为名神，因此忠有等级，神也就有等级。强调生与死的等级同一性。（3）忠只有效果，不问出身，更不能计较利害。所以有用之人其行为不一定全合乎忠，无用之人其行为也不一定就不忠，因此人人都可以行忠。《忠诰》是《忠经》的补充，它进一步规范了等级制度，强调了忠的行为纯洁性，不能有私心杂念。^②因此，《忠经》的灵验篇及其报偿价值观在《忠诰》里就站不住脚了。

《居官圭臬》除上述两篇假鬼神以立言、借报应以立信外，还辑略了“从政汇录”（附劝幕宾、致乡绅）、“从政格言”、“家长约”、“乡坤约”、以及法律审判实务（如法医、检验）和监狱行政管理等理刑专业的经验总结等。

《居官圭臬》在理念上只是重复忠和孝的

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官员的行为规范，并无多少新意，还掺杂不少封建糟粕。但它也体现了沈葆楨的重民思想和务实行为。(1) 它强调做官必须以服务老百姓为第一要义。如说：“为官一日，要行一日好事”，“以疼儿女之心疼百姓，…理家务事理地方”，“居官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等等。(2) 制定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如理刑要公开透明；问事但论曲直，不问强弱；立法要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剥下奉上，不废弛公务，不为子孙谋利，不贪污受贿…等等，都是针贬时政、纠正吏弊的基本要求。^③ (3) 加强胥吏的管理，以杜诡诈奸宄的虐民歪风邪气。(4) 具体收录了行刑、检验和狱政等刑律实务。^④《居官圭臬》还强调正确对待士绅群体，运用士绅力量，倡导士绅奉公守法，和政府合作，以发挥士绅在救灾、征税、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潜在力量。^⑤ 都有俾于地方战时社会的稳定和恢复。

(二)

沈葆楨的上述民政理念，引导他在江西战时民政运作中的各项改革措施，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整饬吏治，健全行政管理。

正如上文所述，沈葆楨认为一个好的地方官比一个指挥官更重要。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正确的政策措施要靠亲民之官来树立和贯彻，才可弭乱于未萌，治乱于根本。因此，沈葆楨在完善人才的使用和加强官员的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合理使用人才，官员的才能和职能必

须相称。沈葆楨到任不久，就将吉安和南康两地知府对调，吉安是严邑，民风强悍，抗税、械斗成风，而知府高延绶处事慎微。南康知府曾鼎山则办事果断威猛，所处民风较为纯朴。两人对调，各适其才。但吏部批驳，要将高延绶解职，另行安置。沈葆楨奏复说：“地方治乱系于知府者为最矩。…诚以民生之疾苦，牧令之贤否，惟知府闻见最真，亦措置最速，故得一良将不若得一良守。”两知府对调，原为人地相宜起见，“曾鼎山到任数月以来，威猛兼施，渐著成效；高延绶稍加阅历，亦非弃才。庶积疲之区，渐望起色，而初任者亦服习吏治，以期收效将来，则地方人事两受其益。”^⑥ 既重用了曾鼎山，又培养了高延绶，体现了沈葆楨善于识才、爱才和用才。沈葆楨又认为用才必须才德相孚。他对曾国藩留在江西的某些官员，其政治品质稍差的也不曲徇私情，予以辞退。他对曾国藩使用江西辞退的官员也感到不满。^⑦ 沈曾二人因用人标准的不同有过矛盾。其实，曾国藩也有他的苦衷，他认为民政官与军事官所处的环境和任务不同，因此二者的要求不同，任用的标准可以有差异。他对胡林翼说，有的人讨贼则可，服官则不可。战地用人标准，着重军用之才，可以放宽一些。^⑧ 沈葆楨又善于发现人才和推荐人才。他上的《访举贤士以励风俗折》，推荐了前翰林院修撰刘绎。前湖南辰沅道方鸿、广丰县进士郑维驹、金谿县举人徐仗祖、庐陵县廪生王其淦、上饶县增生候选训导曾守诚等，“各该绅等或具练达之才，或怀贤贞之操，给资送部，带领引见。”他重视士绅精英，为团结士绅和运用士绅起到作用。^⑨ 此外，他还拒绝为

亲朋戚友挂职，以杜倖进之风。^⑩沈葆楨任人惟才，任才惟贤，以及杜绝寅缘干谒，在用人源头上把住吏治关。澄本清源，大有远见。

沈葆楨为延揽人才又请准恢复江西地区的考试。“江省军兴以来，历届步科两试多未竣事。…士习为民风所系，真才时逢拔擢，则兴奋观感，粗犷之俗，渐成温良，此亦朝廷重制举之微意。”^⑪指出了重视人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改善民风的根本措施，并为知识分子恢复了仕途出路，寓有笼络士绅的作用。

2、严惩腐败，树立正气。文官爱钱，武官专横都是残民的祸首，降低了政府的声望。沈葆楨对之采用坚决的镇压手段。如代理贵溪县知事陆长庆将郑姓三千两捐输吞没二千两，特参“革职，永不叙用”。^⑫莲花营都司陆得胜逗留吉安，横行无忌，私刻铃记，不遵调令，冒领薪饷，侵吞口粮和把持公事种种违法罪行，判决正法。^⑬都司刘青云诈赃妄拿民人郑作奎，致郑在营自缢身死，判令绞监候加拟绞决。^⑭对失职官员，沈葆楨亦依律严惩不贷。由于清江县上游豪绅多次违令乱筑堤坝护田，导致泄洪不畅，接二连三冲毁清江县数十万农户的田地。沈葆楨责令重修堤坝，地方官员又故意拖延，他立即派兵抓捕首要豪绅杨万和等五人就地正法，临江知府单兴诗和代理清江县知事张兴会均属姑息贻患，一并交部处理。^⑮沈葆楨严惩腐败的铁腕作风，对不法官员起了震慑的作用。知县石昌猷诬陷许高鸿忤逆。沈初不察，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专折请旨审办此重案。石昌猷就地正法，沈自请议处。沈葆楨为执法官员认真负责严于律己树立了榜样。

3、严格地方官的考核，是非分明。江西

战时政务废弛，地方官不尽职的现象十分严重。正如曾国藩所说，城池失守不一定是太平军强大，而是抵御乏人。^⑯1856年，江西14个府城中的8个、75个县城中的53个陷落，都因官员失职。清政府出于战时财政困难而卖官鬻爵，又是官员队伍庞杂和素质低下的原因。沈葆楨到任便在严惩腐败的同时，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如1863年的官员年度考评，一次就解除了6名不称职官员的职务。^⑰但是，沈葆楨又十分爱护属员，保护他们的权益。如九江关不能开关有客观原因，而历任监督严谴撤换，沈葆楨为之申辩。他指出，九江关所以不能开关是因为主要税源（竹、茶、木、盐与船料）减少，并非监督借词延宕。朝廷一再调换监督，无俸无国帑的收入。因此，他提出变通的做法：九江关暂不给固定的定额任务，能收一分即得一分之用，等到征收上了轨道，摸清税源，再行计议。^⑱他为九江关之不及时开关做了实事求是的辩护。

4、正确对待士绅，抑制豪猾，爱护精英。士绅群体包融了不同阶级的属性，表现为对儒家价值观取向的差异性。其中一部分精英可以支持政府行为，并为政府出谋献策；另一部分可以堕落为把持地方、武断乡曲的豪猾，残民肆虐，破坏政府的政令，影响政府的威信。沈葆楨十分重视士绅在战时民政所起的作用，推荐精英，给予荣誉；恢复考试渠道，有利仕途晋身；具见上文。不法士绅则严加惩处。清江挖堤大案一次便处决了不法劣绅杨万和、傅映松、杨德顺、傅敏幅及傅昭荣等五人，豪猾一时震慑。

二、整理财政，增加收入，合理民负。

抗击太平军的军事行动，江西是战区，大

部分府县曾被占领，还要分担曾国藩的军饷。1962年正月，沈葆楨接任巡抚那年扒付曾军的军饷为每月漕折五万两，关税三万两。而民生凋弊，税源萎缩，社会失序，征税困难，地方财政陷入窘境。沈葆楨着力整理财政，有两个重大措施。

1、进行赋粮征银改革，核实并稳定财政收入。在此之前，曾国藩为保障战时财政供给，培养税基，进行赋粮改革，减免农民欠税。他将土地税与人口税合并，每两税银交2400文，漕折每担交3000文。^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占有者的负担。但由于用铜钱纳税，而铜银比价一再下落，政府收入又渐减少。沈葆楨又做了两项改革：一是重新核定税额，改征银两，以1600文换银一两，地丁税折银每2400文为1.5两，漕折每担纳税1.9两。二是采取了灵活的交税本色，每年按铜银比价决定是用铜钱还是用银两纳税。^⑪因而稳定了财政收入。沈的此项改革在江西一直沿用了几十年。

2、制定了预算制度。沈葆楨规定了地方税和漕折银的上交和留成标准。据刘秉璋巡抚（1865-1878）于光绪三年四月廿五日的奏折，漕折银1.9两的分成是：上交中央1.3两，省行政0.2两，省库及县行政0.4两；地丁税的分成是：上交中央1.1两，省行政0.1两，省库及县行政0.3两。^⑫这样，保证了地方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以应付地方的支出，遏制了地方乱收费和乱摊派的现象。

三、重视群众福利，减轻百姓负担。

1、京师缺米，朝廷要求江西将漕船北运，沈葆楨认为此举耗费过大，请予变通，改购洋米。他在同治元年六月廿九日的奏折说，糟米

装船北运，存在三个困难：一是粮库分散，河道阻塞，沿途治安不靖，集运困难；二是漕粮由江入海而江面易受太平军袭击；三是长途运输，偷蚀中饱难于防范。因此建议京师需米可通过南洋米贩采购，“兼旬可达津门，庶见航海而来者，多一分养人之洋米，即少一分害人之洋药。”又把压缩鸦片运力的好处联系起来。至于江西漕粮，另行讲求运法。沈葆楨还于次年二月六日再一次重申上述主张。为江西省老百姓减轻了负担。

2、反对停用官票（纸币）。江西于咸丰四年始设宝丰官局发行官票，当时应发的兵饷及俸廉，支发八成现金，二成官票，抚恤金则全部支发官票。官票准许完粮纳税，州县也可以二成官票抵解地丁税。官票搭发比例往后又做过调整。这时中央为弥补钱粮亏空，打算停发官吏薪俸和兵饷的官票部分，等于薪饷打了折扣，抚恤金全部取消。沈葆楨因于同治二年四月廿九日奏复具体实情，“官票碍难停止”，为稳定官员和将士收入，保障死亡将士家属的生活，做了一桩实事。

四、正确处理南昌教案，保护人民的利益，捍卫国家的主权。

沈葆楨于1862年3月15日接任江西巡抚，两日后就发生了南昌教案。17日聚集在南昌的应考生员怀疑天主教教育婴堂有虐杀婴儿情事，入晚焚毁了多处教堂。法领事扬言将派兵船前来。而总理衙门慑于外力，勒令赔偿教堂，拿办人犯。这是沈葆楨从政后碰到的第一桩涉外事件。他立场坚定，态度从容，在家信中写到：“士人将教堂折为平地，出于义愤，不能说他不是；夷人不敢与民为仇，而在京者危言恫吓，总理衙门勒令赔偿教堂，拿办人

犯。…然抑民从教，实与世道人心有碍，我不能抑民从教。”^②他为此做了实访记录上报，晓陈利害，宁愿自请议处，也不肯妄拿一人。他还深刻揭露了传教士的伪善面目。这与当时一些官员处理外事求全邻好而保教抑民的媚外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沈葆楨坚持民族正气，保护人民利益和维护国家主权，在往后巡台和督江的涉外案件中都一脉相承，是华夷之辨的经世务实态度，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

(三)

从以上看来，有三点体会：

1、儒家的治平思想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绝对等级制度，进行全民的忠君尊王的心理教育；二是强调统治者长治久安，必须施行仁政的民本思想。二者相成则治，相悖则乱，从而归结于忠和孝大跨度的相对矛盾的统一。这是沈葆楨服膺儒家思想用以治理民政的道德理念和行为准则。

2、儒家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尖锐对立，伴随着社会转型期而出现的中西文化碰撞，尊王与攘夷之间必须作出理性的调整。沈葆楨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在相对排斥中找到包融，从包融中又突出民族文化的主体。这也是洋务派所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以制夷的共同认识。沈葆楨在江西民政治理和往后

治台督江的具体运作中，能以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趋向经世致用的功利行为，是出自历史的必然。

3、沈葆楨思想的包融性是晚清社会演化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探讨沈葆楨在江西民政治理所形成的理念与作为，就是要在这一环中寻求他的传承价值。

注：

①以上均引自《居官圭臬》忠经

②《居官圭臬》忠诰

③《居官圭臬》从政汇录

④《居官圭臬》下卷各章

⑤《居官圭臬》家长约和乡绅约以及劝幕宾等篇

⑥《政书》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折

⑦《曾集》1860年致沈葆楨函

⑧《曾集》1859年致胡林翼函

⑨《政书》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折

⑩《家书》第328页

⑪《政书》同治二年二月初七日折

⑫-⑭《政书》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九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各折

⑮《政书》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折

⑯《曾集》奏议

⑰《政书》同治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折

⑱《政书》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折

⑲《曾集》奏议

⑳㉑李桓《宝韦斋》

㉒《家书》同治壬戌年五月十一日

徐寅生卒考辨及“拂衣”归隐问题

——兼与周腊生先生商榷

□ 许更生

拜读了《莆田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上周腊生教授的《五代莆田状元徐寅考略》一文，颇受教益。尤其是周先生关于“徐寅只能是开平四年（910年）状元”的考证十分翔实，令人信服。不过，其文章中关于徐寅生卒年的推估，却有值得商榷之处。现分述如下。

（一）

关于徐寅的生年问题。

周先生说：“徐寅的生年。他是经过多次应举失败后，方于唐乾宁元年（894年）第一次及第，此时年龄至少应有二十大几。……他进士及第时也应该有20多岁，比如说26岁吧，那么他就生于公元869年。”

如此这般的推断未免过于简单，失之武断。诚然，唐代科举折桂者犹如“凤毛麟角”，进士科每年才30名左右。“进士大抵千只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选举三》）。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王定保《唐摭

言》）。然而，事实上，也并非没有少年得志的幸运儿。仅以我手头现有的几本志书看，唐代著名诗人王维21岁登进士第，杜牧25岁进士及第；同是唐末福建惠安的黄纳裕，23岁就高中进士者（851年出生，874年及第）。所以，周先生所谓的“此时年龄至少应有二十大几”、“比如说26岁吧”的推断方法是欠科学、不全面的。

我以为，推算徐寅生年的关键，在于确定徐寅是哪一年从闽王王审知那里归隐家乡的。而这一点，又与李存勖的旧案重提、借刀杀人密切相关。

事情是这样的。唐天复初年（约901、902年），徐寅漫游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开始“梁苑二年陪众客”（《自咏十韵》）的宦游生活。一天，在梁王朱全忠所摆的酒席上，徐寅酒喝多了，说话时无意触犯了全忠的忌讳，全忠马上放下脸来，气冲冲地说：“客人触犯忌讳，是主客未交待清楚的过错！”当场下令把接待徐寅的官员捆绑起来，将其“斩于界石南”。这番“杀鸡教猴”的举动，使得徐寅十分狼狈。他想悄悄溜掉，但还没走多

远，就被朱全忠叫住了，并且斥责他不告而别。如何脱身才好呢？情急之中，出于万般无奈，徐寅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虎口脱险的方法，于是挥笔写了一篇《游大梁赋》献给朱全忠。其中有句说：“千金汉将（指韩信），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指朱全忠的头号敌人李克用），望英风而胆落。”朱全忠经常吹嘘自己曾梦见韩信授予他兵法；他的死敌李克用是独眼的沙陀族人，作战斗时曾被打瞎一只眼睛。这一联对句讨好朱全忠而奚落他的对手，所以朱全忠顿时心花怒放，特别开心，于是立即转怒为喜，不仅不想杀徐寅了，而且马上叫人按一个字一匹绢的酬劳，取出五百匹绢赠给徐寅，还叫手下士兵传念徐寅的《游大梁赋》。虽是因迫不得已写了《游大梁赋》，却着实得罪了“一眼胡奴”李克用，埋下了险些遭杀身之祸的祸根。（《十国春秋》卷九十五）

虎口余生的徐寅仍然心有余悸，寝食不安。不久，他找了一个借口，跑回福建。

梁龙德三年（923年）四月，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称帝于魏州，称为庄宗，国号大唐，改元同光；十月攻克汴梁，梁主朱友贞自杀。十二月，李存勖迁都洛阳。同光二年（924）二月，王审知的称贺使者入京进贡。接见之时，没想到唐庄宗竟然旧话重提，他怒冲冲地查问福建使者：“徐寅还活着吗？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当年徐寅侮辱我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不可不报！你们怎么还收留他呢？”使者回到福建，向王审知如实禀告了李存勖的话。

面对后唐主庄宗李存勖想借刀杀人的无理

要求，王审知万般无奈地予以灵活处理，只说：“那我以后不用徐寅就是了，杀则不可奉诏。”因此，年已六十的徐寅才得以平安返乡，隐于延寿故居。

考虑到当时旅途往返时间等因素，则徐寅离榕归乡的时间当在925年上半年，时年60。这有其《新屋》一诗为证。为了回乡有个安身之处，“耳顺”之年的徐寅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盖了座茅屋，并写下《新屋》一诗，其首句便是“耳顺何为土木勤”。

徐寅本人当在是不会拿自己的年龄说谎的，即使写诗，恐怕也不会出入太大。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据此来推断出徐寅的出生时间了，即为865年（925-60=865年），这里就不计虚岁还是实岁了。

（二）

接着谈谈徐寅的卒年问题。

周先生根据《十国春秋》卷九四的有关记载（即“初，太祖从子延彬刺泉州，寅每同游赏，及陈郟、倪曙等赋诗酣酒为乐，凡十余年。常被病求药物于延彬。”《全闽诗话》卷一文字几乎相同，只是“寅”详作“徐寅”。）推断：“很显然，徐寅‘拂衣去’是后唐取代后梁的那一年，即龙德三年（923年）的事。从这年算起，后推‘十余年’，假设他隐居了15年，那么他约卒于公元938年。也就是说，徐寅大约少了70来岁。”

然而，这个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推断也是不严密的。理由有三：一是贸然把“十